

三国鼎立 形成的 历史原因

张大可

一、多因素的历史原因

三国鼎立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历史课题，不仅三分故事自宋代以来由于平话、戏剧、小说的影响，已是家喻户晓；而且形成三分的历史发展，威武雄壮，可供我们许多有益的启迪和借鉴。但是三国鼎立形成的历史原因这一课题的研究，似乎还是一个薄弱环节。目前史学界已成定论的观点认为：“三国鼎立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地区封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分裂倾向的加剧。其理由是：“长江流域上下游几个区域的封建经济，发展到了勉强可以自给和彼此均衡的程度，给南方孙、刘的割据提供了物质基础；而同一时期北方的国家则由于社会经

济受到割据混战的严重摧残，无力消灭南方的国家，以统一中国。”^①这就是三国鼎立的“必然性”理论，可名之曰“经济均衡论”。史学界已发表的学术论文，出版的学术论著和各种教科书，对三国鼎立的看法都没有越出“经济均衡论”的藩篱。事实上，早在春秋战国之际，长江流域已有巴、蜀、楚、吴、越等国家的建立，何待于两汉以来的江南开发形成经济均衡！割据长江上流的刘璋、刘表、甲兵资实，不弱于孙吴，更不次于刘备，何以要待刘备来建立蜀汉形成曹、孙、刘三家对峙！可见“经济均衡论”是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

从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年历史发展的整个长河来看，王朝兴衰，军阀混战，群雄割据，南北对峙都一再出现，而三国鼎立是唯一的一次历史存在，可见这一历史局面的出现是一个特例。特例是历史发展中的变异，就象生物遗传工程上的变异一样，有它变异的特殊原因，而不能用“常规”的必然性理论去解释。

中国秦汉以后的封建王朝，最长的莫过于盛唐、朱明，大清，这三个朝代都没有超出三百年。短命的王朝如秦朝、隋朝只有几十年，每一个封建王朝解体，都要出现军阀混战，群雄割据，而后走

然。如果说，研究方法的要点是由对象的内在特点所决定的；那么，系统性综合化的研究对中国政制史来说实属必然趋势。

注释：

- ①语见《隋书·儒林刘炫传》
- ②《汉书·石奋传》
- ③其实例如《隶释》卷三《无极山碑》
- ④如《金石萃编》卷四《秦琅玕台刻石》
- ⑤《汉书·石显传》《后汉书·周景传》
- ⑥《汉书·元帝纪》
- ⑦《汉书·丙吉传》
- ⑧《通典·职官二》
- ⑨《晋书·荀勖传》
- ⑩《文献通考·职官九·原注》《十七史商榷》卷四九
- ⑪《晋书·荀崧传》
- ⑫《隋志》下，本文凡仅言志者，俱为官志。

⑬《汉书·韦玄成传》

⑭《汉旧仪补遗》卷上：“郡邸狱治天下郡国上计者。”

⑮同上书：“上林诏狱主治苑中禽兽官馆事。”

⑯《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引如淳曰：“治水官。”

⑰《三国·魏志·武帝纪》

⑱《初学记·职官部》引《汉官仪》

⑲《三国·魏志·王观传》

⑳参《汉书·刘屈氂传》

㉑《后汉书·鲍昱传》

㉒㉓两例皆见《后汉书·本传》及《宦者传》

㉔参《隶释》卷六《中常侍樊安碑》

㉕《三国职官表·序》

㉖《通典·职官三》

㉗参《汉书·文帝纪》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历史系）

向统一，形成了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②的周期性运动。这可以看作是封建地主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运动。因为自然自足的封建经济，即使在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下，“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③中央集权力量一旦削弱或解体，就要出现群雄割据的局面，而割据混战破坏生产，给人民带来无穷无尽的灾难，所以它是不能持久的。人民要求和平，反对战争，要求统一，这是历史的趋向。群雄割据中的优胜者，顺应历史的趋向，他就能平叛战乱，统一中国，秦、西汉、隋、元、明等封建王朝末年的战乱，很快走向了统一，这就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常规。南北对峙就打破了这一常规。中国历史上有东晋与北方十六国之对峙，有南北朝之对峙，有北宋与辽之对峙，有南宋与金之对峙，这些对峙历史都有比较复杂的历史原因，而不能用“经济均衡论”加以解释，更何况三国鼎立。

形成南北对峙局面的主要历史原因，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迫使政治腐败的汉人政权退到南方，依恃长江天堑作为屏障而偏安江南。由于这样的历史条件一再重演，所以南北对峙的局面也就一再出现。东晋与南宋两个时期的南北对峙，南方的经济实力大大超过了北方，而人心向背也有利于南方，因此祖逖北伐、桓温北伐、刘裕北伐、岳飞抗金都取得了节节胜利，但是由于南方政权的政治腐败而使北伐总是归于失败，显然“经济均衡论”在这里是无法解释的。东汉末年没有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而是军阀混战演成了三分，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因而形成了一个历史发展的特例。

“经济是基础”，任何时候这都是立国的基本条件。东汉末年的战乱，北方经济残破，没有力量支持曹操不停顿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确是三国鼎立的一个重要因素。曹操南下荆州，接着又东进赤壁，连续大规模作战，北方经济无法承受。吴国的朱治就说：“中国萧条，或百里无烟，城邑空虚，道殣相望，士叹于外，妇怨乎室，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以此料之，岂能越长江与我争利哉？”④周瑜论曹操必败，原因之一是“又今盛寒，马无藁草”，⑤也说明了北方后勤供应不继，士卒乏衣粮，马乏草料，乃是一种冒进，但是，当时曹操已得天下十之七、八，长江上流的益州牧刘璋遣使请降，只有区区江东六郡相抗，且孙权内部未靖，山

越未服，南北对抗众寡悬殊并未形成均衡。只要曹操计划周密，时机得宜，不冒进赤壁，完全有统一中国的可能。赤壁战后，荆吴之势强，刘备入蜀，三国鼎立形成，未出现了南北的经济均衡，对于“三分对峙”有一定的影响，但仍不是主要的因素。因为曹魏的实力，仍大大强于吴蜀二国力量之和。尤其是蜀国这个弱小政权，远不敌曹魏，而诸葛亮居然能够屡次北伐，蜀国所恃是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以及吴蜀两国的互为犄角之援。经过几十年的对峙，北方经济恢复，吴蜀两国政治昏暗，人心反向，曹魏的人力、物力占了压倒的优势，三国也就归于一统了。经济的因素最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以此来反证，三国鼎立决定于南北的经济均衡。

学术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东汉末年发展起来的地方割据势力与地主独立经济是三国存在的前提条件”，⑥这是没有疑义的。东汉末年战乱，豪强地主各拥兵自重，率族自保，有的则作有计划的迁移，或择主而居，或占山为王。如颍川荀彧或北依袁绍，后投曹操，临淮鲁肃南渡，往依孙权，都是举族而迁。右北平无终人田畴则是一个占山为王的典型豪强，北方乱起，他“率举宗族他附从数百人”，入徐无山中，“营深险平敞地而居，躬耕以养父母。百姓归之，数年间至五千余家”。田畴制订了约束部众的二十余条法纪，“法重者至死”，又制订了婚嫁之礼，学校授业之法。田畴还遣使与乌丸、鲜卑交通，使之致贡，俨然是一个独立王国。⑦在全国各地林立着无数个象田畴这样的强宗豪右，他们就是东汉末军阀割据混战的社会基础，割据一方的州牧郡守，如果得不到这些地方豪强的支持，就很难立足。据有北方幽、冀、青、并四州的大军阀袁绍，招命田畴；又即授将军印，礼命五至，畴终不出。曹孙刘三家都是得到豪强地主集团的支持发展起来的。公元一九四年陶谦让徐州给刘备，刘备不敢受。后得下邳陈登支持，刘备才领徐州牧，但终因基础薄弱，刘备两次得徐州，两次丧失了徐州，在北方不能立足。后来他在荆州驻屯十余年，依靠荆州地主集团入蜀，又得益州地主集团的支持才建立了蜀汉。孙权得江北大族张昭、周瑜支持，特别是得到江东地主集团顾陆朱张四大姓以及全氏贺氏等豪强的支持，才站稳江东。曹操是以颍川荀氏、沛国曹氏、夏侯氏地主集团为基干，广

泛罗致北方地主集团的支持发展起来的。袁曹角逐，曹胜袁败，因素很多，但其中一个因素，就是象田畴这样的众多豪强弃袁投曹，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袁曹双方的力量对比，才使得曹操由劣势转变为优势，并在战胜之后，能够稳住局势，巩固对所占地区的统治。

但是，地主豪强集团的割据性只能说明它必然导致军阀混战，并不能说明必然形成三分。因为“军阀混战”与“形成三分”之间在逻辑上并无必然联系，二者不能划等号。东汉末年的所有军阀都得到了各自所割据地的地主豪强集团的支持。当然，如果没有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就没有三国鼎立局面的出现。在这个意义上，“东汉末年发展起来的地方割据势力与地主独立经济是三国存在的前提条件”。所谓“前提条件”，就是“先决条件”，或者叫“可能条件”，它只是提供“形成三分”的可能性，并不是必然性。因为军阀混战可以兼并为三；也可以兼并为二；也可以兼为一，即直接走向统一，前已述及，东汉末年战乱走向三分，是中国封建王朝改朝换代中出现的一个历史特例，还有更深刻的历史原因，这是必须深入研究的问题。

三国鼎立有着多因素的历史原因，经过极其复杂的历史演变才形成的。如果我们划分一下三国鼎立的历史发展阶段，就可明显地看出来。三国鼎立的历史发展，从公元一九〇年关东兵起到公元二八〇年西晋灭吴统一天下止，前后九十一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公元一九〇至二〇七年是东汉末群雄割据阶段，前后十八年，从人才均势上形成了曹孙刘三个集团，公元二〇八年赤壁之战至公元二二九年孙权称帝，是三国鼎立形成阶段，前后二十二年，三方斗争交错，内容复杂，形势发展瞬息万变，最终形成了三分的地理均势和政治均势，三国鼎立才得以确立。公元二三〇年至公元二八〇年，是三国对峙并走向统一的历史阶段，前后五十一年。半个世纪的“三分对峙”，地理均势起了主要作用，南北的经济均衡作为地理均势的补充也起了重要作用。研究三国鼎立不同阶段的历史发展，尤其是第一、二两个阶段错综复杂的历史内容，可以鲜明地看出，“形成三分”实非某种单一的历史原因所决定，也并非必然要出现的局面，而是各种各样的主客观原因，通过无数的偶然事变，交互作用的

结果。当然，历史的偶然又寓于必然之中。历史研究的任务，就是要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揭示这种寓于必然之中的偶然是怎样引导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是将复杂的历史内容规范在简单化的必然性公式模式中。

所谓“必然”，是指历史发展的趋向和客观的历史条件。东汉末年豪强地主集团的经济膨胀有很大的割据性，必然带来军阀割据混战；反过来，割据兼并必然导致统一，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趋向。南北的经济均衡和吴蜀两国所依恃的地形险阻，是客观的历史条件。所谓“偶然”，是指东汉末年军阀混战走向统一的过程中，出现了三分鼎立的局面。这一局面是由于三分的人才均势，三分的地理均势，三分的政治均势等多种历史原因的交叉才形成的。三分的人才均势，三分的地理均势，三分的政治均势都是“偶然”的事变。这些历史事变是“人谋”起了主导的作用。下面分层次论述三国鼎立形成的多因素历史原因，并着重分析“人谋”的历史作用，以供讨论。

二 东汉末军阀混战所形成的三分人才均势

三分的奠定，首先是在军阀混战中，使汉末人才分散，形成了曹孙刘三个坚强的领导集团。

汉末军阀，穷凶极恶的董卓，顽悍乐杀的公孙瓒，贪利赖宠的陶谦，倏彼倏此而横的吕布，狂愚而逞的袁术，雍容论道的刘表，昏暗懦弱的刘璋，都无戡乱之才，他们的作用是胜利者驱除，在群雄角逐中注定要被歼灭。志大疏略的袁绍，文武兼资的曹操，弘毅宽厚的刘备，任才尚计的孙权，都有统一天下之志，任人有方，馭才有术。而后袁绍败亡，演成了三分之局。

官渡之战奠定了北方的统一，消除了一个争天下的强手；赤壁之战曹操受挫，孙刘之势强，于是奠定了三分之势。本来这两次战役都有混一天下的可能。袁绍鹰扬河朔雄视天下，设若官渡之战袁胜曹败，袁绍君临天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曹操统一北方，“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①，若赤壁战胜，称孤道寡乃必然之势，但这两次战役都是强者败，弱者胜，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从而改变了历史的天平，使偶然因素变成了必然之势。这里的“偶然”，是指曹操官渡告捷，孙刘赤壁战败，带有“偶然性”；但已然胜利之后，使形势渐

转，成为了不可战胜的强者，这就是“必然之势”。反过来说，叱咤风云的袁绍和曹操，不听谋臣劝谏，丧失了取胜之道，只是“偶然”的一着失计，造成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的“必然”后果。

袁绍之败。袁绍在官渡之战以前一直是走上坡路的，他积累了许多争天下的优势。袁绍不仅有可恃的袁氏四世五公的政治资本，而且他本人有“姿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具有雄略的气质。在政治斗争中，袁绍主谋诛灭宦官，又首倡讨董卓，大得人心。韩馥让冀州，袁绍受之，而豪杰之士多归之，数年之间，遂兼有河朔四州，天下无敌。沮授、田丰、审配、逢纪、辛评、辛毗、郭图、许攸等智士为之谋，鞠义、颜良、文丑、高览、张郃等勇士为之统其军。但是官渡之战，袁绍一败涂地，从胜利的顶峰跌落下来，坠入了灭顶的深渊。袁绍官渡之败的主要原因是因胜而骄，一意孤行，以个人之智敌曹操之群士。他不纳田丰之谋，不用沮授之计，既要急于进取，而又丧失战机，不在曹操东征刘备之时进军，再能不败。袁绍外宽内忌，能聚人而不能用人，不仅荀彧、郭嘉、董昭等智士离他而去，就是效死之士如沮授、田丰等也无所施其能。张郃、许攸则因其计不用，愤然阵前倒戈。袁绍逞个人之智，又碰上了曹操这样一个棋高一着的对手，他就难逃覆败的命运了。官渡之败暴露了袁绍的弱点，他不是曹操的对手。在奉迎献帝问题上，袁绍拱手让曹，就输了一着。然而这是对全局成败有决定性影响的一着，袁绍输了，处处被动。曹操赢了这一着，全盘皆活，处处主动。袁曹二人相较，袁绍凭藉的是“力”与“地利”，曹操依靠的是“智”与“道术”，两人政治素质的优劣不待分辨而高下自分。《武帝纪》中有曹操与袁绍如下的一段对话：

初，绍与公共起兵，绍问公曰：“若事不辑，则方图何所可据？”公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公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袁绍实现了他的“南据河，北阻燕、代”，也可算得上群雄中的佼佼者。但与曹操相比，袁绍只是一个“小器”。王夫之说：“起于纷乱之世而欲成大

业，非能屈天下之英雄，不足以建非常之业。”⑨袁绍能屈韩馥、公孙瓒之辈，而不能屈曹操，故不能建非常之业。曹操高于袁绍，不只是个人的政治素质，而主要的是他所推行的政治路线。袁绍看重的是地利和兵力，曹操看重的是人才和道义。所以诸葛亮说：“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⑩十分精当。

曹操赤壁之败。曹操用兵如神，善能以少胜众，以弱克强，但在赤壁之战中却是御众而败，盛强而摧，大出意料之外。王夫之分析说：“操之所以任天下之智力，术也，非道也。术者，有所可，有所不可，可者契合，而不可者弗能纳，则天下之智力，其不为所用者多矣。”这就是说，曹操也没有真正做到诚心任用智力以扶持大议，而是为一己之私利用权术驾驭人才。谋士的意见，投合自己的私心就采纳，不投合自己的私心就不采纳。曹操的赤壁之败，正是如此。他不听贾诩、程昱的善计而急于东进，重蹈了袁绍拒谏的覆辙，走上了恃众欺寡，恃强凌弱的失败之路。曹操之急于东进，也正如袁绍之急于南下一样，是急于做皇帝梦，故冒行以建非常之功，结果是志骄意得，欲速而不达，被孙刘联军的智力所击败。赤壁之战是一场斗智斗力的群英会。孙刘两家的谋臣武将，齐心合力共御曹操，而曹操却颐指气使，以一人刚愎自用之智，抗天下群英之会，败亡也就是必然的。

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都是奠定三国鼎立的重要战役，前者袁绍失败，后者曹操失败，使统一的局势一再受挫，而演成三分之局。这两次弱者挫败强敌的战役，都是“人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赤壁之战，刘孙联合的基础就是以人才三分的均势为前提的。诸葛亮的隆中对策就是“人谋”在规划三分。尽管刘备败逃，无存身之地，但“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敌”⑪，所以孙权对诸葛亮说：“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⑫。诸葛亮出使江东就是以鼎足之形为条件与孙权进行谈判的。他对孙权说：“今将军诚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规同力，破操军必矣。操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

东汉末军阀混战，为何人才三分，这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是一系列偶然事变的分合所形成的必然之势。前已述及，荀彧、郭嘉、董昭，初投袁

绍，后归曹操。鲁肃与刘晔友善，最初欲依巢湖郑宝，而后两人分道扬镳。诸葛亮、诸葛亮，同胞兄弟，一个辅孙权，一个佐刘备。在乱世之中，局势未明朗之时，际遇交合带有较大的偶然性。但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天下扰攘，君择臣，臣亦择君，又是必然之势。东汉末年的人才形成三分而未若江河之归大海，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试分析如下：

客观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汉朝还没有完全失去其继续存在的合理性，刘姓皇帝仍是一面旗帜，两汉儒学昌盛，它所宣传的君权正统观念深入人心，士大夫多尚气节。袁绍在反对董卓废立时就说：“汉家君天下四百许年，恩泽深渥，兆民戴之来久。今帝虽幼冲，未有不善宣闻天下，公欲废适立庶，恐众不从公议也。”^⑩二是东汉世家大族正处于上升时期，多名节之士。尤其是两次党锢之祸，士大夫反对宦官专政，赢得了天下人的归心。这两个客观因素对曹操有得有失。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占了优势，四方人才多归往之，这是得。但曹操出身于宦官集团的庶族，初起时不敢袁绍，不仅使得一部分北方士人流归了袁绍，如沮授、田丰、审配等；而且延迟了他统一北方的时日，眼看孙权坐大，刘备寄居荆州而不能及早消灭，这是失。关东军讨董卓，孙坚力战第一，义动天下，也赢得了一部分人才的归心。张昭、周瑜、程普、黄盖等倾心辅佐孙氏兄弟，这是孙吴之得，反之则是曹操之失。刘备以皇室之胄，“受左将之命，躬膺天子之宠任，而又承密诏以首事，先主于是乎始得乘权而正告天下以兴师”^⑪，露布衣带诏讨曹，使曹操蒙受“托名汉相，其实汉贼”^⑫的恶名。刘备则以正统自居。诸葛亮辅刘备，不仅仅是报三顾之恩，而且也是扶持正统，这是刘备之得，亦是曹操之失。

主观原因也有两个方面。一是曹操的对手刘备、孙权都是人中之杰，总揽英雄有很大的号召力。二是曹操品德不济，奸险诈伪，暴虐无比，使得一部分智士远离了他，象诸葛亮、庞统等人宁肯归隐待时，也决不北投曹操。陈宫、张逸之叛，就是鄙薄曹操的为人。曹操傲慢，把蜀中使者张松推给了刘备，这是最大之失。东晋史家习凿齿评论说：“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

顷，岂不惜乎！”^⑬曹操不仁，多次屠城，滥杀无辜，并在征战中颁布了“围而后降者杀无赦”的反动军令，所以他始终未能获得“天命攸归”的舆论。曹操兵围汉献帝，失人臣礼，始终带着“汉贼”的帽子打天下。曹操的这些弱点为孙、刘所利用。因此，曹操不能象他的先辈汉高祖、汉光武那样囊括尽天下英雄，也就不能统一天下，只好作了个半壁河山的“周文王”而饮恨九泉。

三 曹孙刘三方的军事、外交斗争和三分地理均势、政治均势的形成

三分的地理均势和政治均势都是三国鼎立的必要条件。这两个条件是伴随着曹孙刘三方之间的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而出现的，也是“人谋”因势利导而形成的必然之势。

所谓地理均势，是指割据集团利用地理条件抗衡对方的一种策略。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使用戈矛甲楯作战，因此占有险固地利形胜的一方在争雄角逐中明显地具有优势。中国的地理形胜是西北高，东南低，东面、南面都濒临大海。所以王朝更替、割据争雄，一再演出北方战胜南方的历史现象。“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⑭；隋唐统一，兴于西北；明清战略，重在西北，南北朝对峙，五代十国战乱，两宋与辽金之对峙，总是北方战胜南方，其中地理形胜是一大因素。这是因为，偏安东南的割据政权，被大海封闭，没有迴旋余地；又处于低地，攻守不利。占有中原的北方政权，不仅占有居高临下的地理优势。而且也是传统文化的正统所在，政治上也占优势，再看区域形胜，从南北看，横贯东西的长江把中国地理划分为南北两大区，南北对峙，南方政权总是依赖长江为天堑。从东西看，以华山、秦岭为界，劈成西北、西南两个闭锁地区，险固便，形势利，中原有事，常为割据之境。在三国以前的西汉末年，就有隗嚣据陇，公孙述据蜀的先例。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陇蜀也是最先成割据之地。诸葛亮的《隆中对》，劝刘备据荆益，就是着眼于三分的地理均势。公元二二二年，夷陵之战，解决了荆州的归属，三分地理均势形成。

所谓政治均势，是指群雄割据或列国纷争之间的均衡外交斗争，形成势均力敌的对抗集团。公元二二九年，孙权称帝，蜀国遣使庆贺，订立中分天下的盟约，三分政治均势形成。

由于以上两个均势的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才巩固下来。但这两个均势并不是平行的两个因素，而是“人谋”规划三分，鼎立所同时进行的两个方面，即一方面谋求地理均势，同时又谋求政治均势，而地理均势是政治均势的前提条件。所以，三国形成时期曹孙刘三方的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都是围绕荆州的争夺而展开的。随着荆州归属的解决才形成了三分地理均势，而后出现了三分的政治均势。至此，三国鼎立的对峙，就成为了必然之势。

荆州处于四通的战略要地。诸葛亮说：“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鲁肃说：“夫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⑧荆州如此重要，其势为曹孙刘三家所心争。赤壁之战前，三家各有自己的打算。刘备要跨有荆、益以成三分。孙权要进伐刘表，西规巴蜀，竟长江所极与曹操对抗，形成南北对峙，曹操要并吞荆州，逼降孙权，统一天下。公元二〇八年，曹操南下荆州，东进赤壁，形势逼使孙刘联盟，孙刘结盟就意味着孙权修正他的规划，走鼎足三分以观天下之变的路线。赤壁战后，孙权借荆州给刘备，奠定了鼎足三分的形势，这是曹操最忌的一着棋，而孙权下了这一着，使得他闻讯后大失常态，“方作书，落笔于地”^⑨。

孙刘联盟是推进三国鼎立形成的最重大的事件，它改变了当时政治格局的力量对比，造成南北均衡，才使得历史的进程向着“人谋”预定的三分轨道向前发展。导演孙刘联盟走向三分的是诸葛亮和鲁肃，而演出这幕历史活剧的主角却是吴主孙权，曹操则从反面起了推助作用，孙权在大敌当前忍痛修正自己竟长江所极的规划，借荆州给刘备，这是非同寻常的抉择。孙权的抉择表现了一个杰出政治家的豪放胸襟和现实主义精神，比袁绍、刘备、诸葛亮的政治气度都要略高一筹，乃至竟出曹操的意外。袁曹官渡之战前夕，刘备不待袁绍大军发动之后，急于袭夺徐州，过早地亮出了反操的旗帜，遭到曹操全力进攻，使自己站不稳脚跟，反过来，袁绍不纳田丰之策，不在曹操东攻刘备之时乘间举兵以袭曹操之后，坐失良机，遭官渡败北。刘备、袁绍两人不肯互援，皆因各存私心，缺乏战略远见，低估了曹操的应变能力。王夫之分析说：

刘备“先绍而举，则大功自己以建，而绍之威不张”；袁绍不援刘备，“亦犹昔者拥兵冀州，视王允之诛卓而不为之援，其谋一也。”结果是“两相制，两相持，而曹操之计得矣。”王夫之的这些分析，可以说是透视了袁绍、刘备两人的心骨。他们比起孙权来要逊色得多。建安十九年刘备不取汉中，东出三峡与孙权争荆州江南三郡，“卒以三郡与吴人，徒劳役吏士，无益而还”，反而让曹操先夺了汉中，“使夏侯渊、张郃深入于巴，几丧一州”^⑩。刘备的这一失计，既伤了同盟和气，又为日后的关羽失荆州种下祸根，表现了刘备政治气度的偏狭。相比之下，孙权却是恢宏大度而又权谋在胸。他既敢于借荆州给刘备，不怕养虎在身；而又不失时机地讨还荆州，步步进取，灵活主动。孙权先是索还南三郡，而后袭杀关羽，全据荆州，改善了吴国的地理均势，增强了吴国的力量。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孙权不惜向曹魏称臣，保证了夷陵大捷。孙权不愧是三国时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孙刘联盟，使两家的事业走向胜利与发展，反之，两家失和，曹魏渔利。孙权袭荆州杀关羽，刘备复仇败夷陵，造成蜀弱吴孤，曹魏更加强大，吴蜀重新联盟，但元气已伤，失去了取胜之势，两国北伐均告失败。但是，孙权不得荆州上流门户洞开，他就坐卧不宁，在同盟中只能扮演附庸的角色。所以孙权要拼全力与刘备争荆州，志在必夺。在这种形势下，刘备与诸葛亮既缺乏灵活性，又丧失警惕性，终于演出了吴蜀的悲剧。从地理形胜看，孙吴取得荆州以后，才真正形成了三分的地理均势，吴蜀两国才有可能结成巩固的联盟。但是蜀汉丧失了荆州，也就丧失了进入中原的前进基地；加之连吃败仗，力量削弱，又不能北据关中，刘备只能偏安于闭锁的益州；守险割据，而兴复汉室的隆中计划也就中道夭折了。

四 人谋在形成三分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孙刘联盟抗曹谋求三分，这是“人谋”的直接因素；此外，政治家和军事家的筹略得失及其际遇凋落，也是促成三国鼎立的重要原因，这是“人谋”的间接因素。本节分析“人谋”的间接因素。

最早提出三分思想的是孙吴谋臣鲁肃。公元二〇〇年，鲁肃过江对孙权说：“肃窃料之，汉室不

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这时鲁肃的规划有两个方案。一是趁北方多务，赶在曹操南下之前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形成南北对峙，此为上策。一是上策不能实现，退而求其次，鼎足江东。由此可见，鲁肃是一个务实派的政治家，他的规划是要依循客观形势的变化，向着可能的趋向而行动。所以当曹操南下荆州之后，他就坚决主张联合刘备，共拒曹操，修正孙吴立国的上策路线以求下策，从而与蜀汉的隆中路线相吻合，取得了赤壁之捷。直接规三分的是诸葛亮和鲁肃，但他们两人都只是规划了三分之形，却并不守三分之势。他们共同的目的都是要兴高帝之业，即统一中国，只不过诸葛亮扶的是刘备，鲁肃辅的是孙权。诸葛亮、鲁肃之谋是合吴蜀两国之力，共灭曹操。至于灭曹之后，则如邓芝所说：“君各茂其德，臣各尽其忠，将提枹鼓，则战争方始耳。”②假如没有周瑜、关羽、吕蒙、陆逊打乱葛鲁之谋，三国鼎立或许不能成立。曹操不敢称帝，正是有吴蜀联盟。曹丕篡汉选择在吴蜀恶之时，这当然不是巧合。从灭曹魏的大局来看，孙权袭荆州，刘备复仇，都是不明智的。但正由于孙刘的失计，吴蜀削弱，曹魏增强，才形成了三国鼎立。由于孙刘双方都想利用对方来增强自己，所以双方的交恶就很难避免，不达均势，则不停止。三分均势并不是葛鲁之谋的本意。这说明，三分虽然是出自“人谋”的规划，但又不为人的主观意志所控制，而是错综复杂的历史演成的必然之势。周瑜想阻挡这个势头，他执意要进兵西川，由于无力越倒刘备这个障碍，含恨死于巴丘，过早地结束了他的生命。《三国演义》描写诸葛亮三气周瑜，逼死这位英名盖世的江东宿将，情节是虚构的，而事情却是真实的。孙权逼鲁肃讨还荆州，鲁肃不能办，也因忧郁而过早地结束了他的生命。周瑜死年三十六，鲁肃死年四十六，都在风华正茂之时而陨落，这都不是偶然的。王夫之慨叹鲁肃早死，关羽骄矜，葛鲁之谋遭破坏，是吴蜀两国的一场悲剧。由于荆州所处的要冲地位，关系着吴蜀两国霸业的成败，其势为两国所必争，若非命士之才，这场悲剧是难以避免的。这又说明孙刘的失计带有必然性。

不过，我们进一步透视三国鼎立形成时期的各种偶然和必然因素，都是“人谋”的得失在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某些由“人谋”导致的必然，例如吴蜀争夺荆州的悲剧也有可能用“人谋”来消解。假如刘备和诸葛亮，尤其是守在第一线的关羽，外交上灵活一些，吴蜀矛盾的爆发不至于如是之速，即使爆发也不至于如是之剧，形势发展可能又是另一番模样。刘备在外交上若能做到缓吴之攻，一旦得了关中，那时蜀国将为上首之国，吴国也许不来索讨荆州了。这一假设有无现实性呢？回答是肯定的。因为赤壁之战，孙刘并力，刘备占江南，孙权占江北。刘备借江北也是形势所致。如果孙权不借，又不能控制刘备，江北处于曹刘夹击之中，亦是不能守。孙权审时度势，把江北借给刘备，树曹之敌，自己却腾出手来巩固江东，进攻合肥，筑起了江北防线。然后又掉过头来争荆州，向刘备讨南三郡，以江北易江南，有分寸，有道义。不幸的是刘备和诸葛亮过于执着“人谋”预画的隆中路线，不识大体，不讲道义，恰如鲁肃所说：“贪而弃义，必为祸阶。”②如果刘备也像孙权一样豁达一些，能够审时度势，西取益州之后，主动退守夷陵一线，把江北还给孙权，吴蜀并力向北，刘备早并汉中，北出秦川，孙权东攻合肥，荆湘联军指向襄阳，曹魏危矣，也许隆中路线得以完全实现。

再看曹魏方面，亦有失着。公元二一四年，曹操取汉中，不趁吴蜀争南三郡之机进兵蜀中，此其一失。公元二二一年，吴蜀夷陵相攻，曹丕不与蜀国并力灭吴，此其二失。如果说赤壁之战是曹操急进而葬送了大好的统一局势；而这两次则是曹魏的迟误而丢失了可能的统一良机。曹魏谋臣刘晔是瞅准了这两次机会的，可惜曹氏父子拒谏不纳，仿佛是天意在安排似的。其实是有原因的。赤壁之战，曹操丧胆，他兵取汉中又费了一番力气，所以不敢贸然入蜀，失之于谨慎。曹丕利用吴蜀交恶，急于称帝，坐失良机。还有更深一层原因，由于三国各方人才精萃，机会之来，一闪即逝，稍一疏失，追悔莫及。正如刘晔对曹操所说：“若小缓之，诸葛亮明于治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则不可犯矣。今不取，必为后忧。”③所以说曹操是迟误之失。曹丕想坐收渔人之利，乘吴之疲，但曹军未出，陆逊早已设防于江矣，

曹丕只好临江而叹：彼有人焉，未可图也”^④。

已然的历史是不能用推论来改写的，但是上述种种分析、评说，并非无稽之谈，而是要从已然的历史中得到深刻的启示。我们强调“人谋”在形成三分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与经济是基础的唯物历史观并不矛盾。曹魏统一中国，经济的因素起了最后的作用。但在形成三国鼎立这一短暂的具体历史阶段，“人谋”的因素则是最活跃最积极的。统一之世，人心安定，国家组织形成固定的格局，“人谋”的一计之得与一计之失，无关大局。因此人才必然遭受习惯力量的压制，不易脱颖而出。纷乱之世，人心浮动，各种力量组合未定，机会之来，一瞬即逝，因此“人谋”的得失改变，政局力量的对比，特别明显，在这种形势之下，各方力量，讲求实效，雄略之主不拘一格录用人才，捷足高才者有用武之地，所以乱世出英雄，英雄造时世。三国纷争既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也是“人谋”引导的格局。本文分析、评说的立论基础是辑录三国时当事人自己的看法来总结三国历史，论从史出，不失为一家之言。

综上所述，三国鼎立形成的历史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就根本性的历史原因来说，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所形成的三分人才均势和三分地理均势是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其中“人谋”的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决定三国鼎立的“人谋”，不是某一个人的主观意志，而是三分人才均势所必然表现出的平衡运动。无论是直接规划三分的葛鲁之谋，还是破坏葛

鲁之谋的周瑜、吕蒙、关羽、陆逊之愤事，以及曹孙刘三方决策者筹略之得与失，都不由自主地在合力地把历史推向三分，这就是三国鼎立形成的必然之势。因此本文所说的偶然与必然，只不过是对于已然历史的描述，而不是某种教条所规范的模式。陈寿撰《三国志》只有纪传而无书志，着重记载三国形成时期的人物，可以说是生动形象地体现了这一历史演变的主旋律，即“人谋”在形成三分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三国演义》围绕诸葛亮写三分，那是艺术的集中，在体现“人谋”这一主题上是与历史事实相吻合的，《三国演义》的主题无非是说明，凡戡乱者、治国者首要的是任天下之智力，即笼络人才，这是历史的教训。文武兼资的曹操单凭权术不能笼尽天下英雄。刘备起自微贱，但他寡仁待众，得诸葛亮大才相辅，故能屡仆屡起而终为人中龙。东汉豪强地主集团分为士族地主集团和庶族地主集团两个阶层。士族地主集团多谋士，庶族地主集团多武将。士族地主军阀如袁绍、袁术、刘表、刘璋等排斥庶族地主，又以世资自矜，所以他们的手下缺乏能征惯战之将和突出的智士，军队战斗力不强，在混战中容易被消灭。至于纠武夫董卓、公孙瓒、吕布、韩遂之流，排斥士族，专逞武力，更易被消灭，曹操、孙权、刘备三家都是庶族地主集团，既多庶族战将，又广延智士，得到两个阶层豪强地主集团的支持，所以在混战中越战越强。三家兴起的原因，固然很多，而他们的用人路线实在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翦伯赞：《中国历史纲要》第2册第5页。

②《三国演义》第一回开篇曰：“话说天下大势，分久不合，合久必分。”这不能认为是简单的循环论观点，而是对于中国封建社会朝代兴亡分合的总概括，而发展方向是走向统一与巩固，故引作“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③《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537页。

④《三国志·朱治传》裴注《江表传》。

⑤《三国志·周瑜传》。

⑥宋绍侯：《略论三国鼎立形成的原因》，载《史学月刊》1958年版第七期。

⑦《三国志·田畴传》。

⑧《三国志·吴主传》裴注《江表传》。

⑨《读通鉴论》卷九。下引王夫之语均出此

篇，不再注。

⑩《三国志·诸葛亮传》。下引诸葛亮语出此篇者不再注。

⑪《三国志·程昱传》所载曹操谋士程昱语。

⑫孙权语见《诸葛亮传》。

⑬《三国志·袁绍传》裴注《献帝春秋》。

⑭王夫之语，《读通鉴论》卷九。

⑮《周瑜传》。

⑯《三国志·刘二牧传》裴注《汉晋春秋》。

⑰《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序》。

⑱鲁肃语见《三国志·鲁肃传》，下引鲁肃语，不再注。

⑲《鲁肃传》。

清咸同年间回民起义评论

李松茂

一、这次起义对清廷打击的沉重

下列“清军镇压农民大起义军费奏销数总计表”^①对我们了解咸同年间回民起义给予清朝廷的打击很重要。

项 目	银 两	百分比%
镇压太平军部分	170,604,104	40.4
镇压捻军部分	31,730,767	7.5
镇压西北回民起义部分	118,887,653	28.2
镇压西南各族人民起义部分	78,736,500	18.6
镇压两粤闽台人民起义部分	22,336,935	5.3
合 计	422,295,959	100.0

从表上可以看出，清朝为镇压西北回民起义支出的军费占支出总数的28.2%，镇压西南各族部分的占18.6%，合起来为46.8%，超过了用于太平天国的40.4%。西南部分中包括镇压苗族、彝族的；西北部分还包括新疆的维吾尔，但大部分应是用于镇压回族的，由此可见这次回民起义对清廷打击的沉重。因为军费支出大体反映了各支起义力量在这次全国范围的大起义中所占的地位，给予清朝统治者打击的程度。清朝统治者必然将军费化在维持其统治最紧要的地方，也就是起义力量对其打击最沉重的地方。太平天国是为首的起义力量，清朝花的军费最多，回民起义是仅次于太平天国的对清廷打击力量。而“在太平天国覆灭了以后，在继承太平天国的捻军也完全失败了以后，西南和西北几个省中的少数民族的群众起义，对于清朝统治者说来，成了主要的危险。”^②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的前期曾为中国历史发展做出了贡献，出现了康熙乾隆那样的杰出人物。鸦片战争以后它逐步走向没落，成为中国历史前进的障碍。中国各族人民为清除这个障

碍，进行英勇斗争，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汇聚成以太平天国为首的大起义，前仆后继、此伏彼起，持续将近二十年。李维汉同志说“这个席卷我国大部分地区、大多数民族的大起义，标志了我国各民族的第一次大觉醒。”^③白寿彝教授说，咸同年间的“云南回民起义和西北回民起义正是当时全中国人民反清斗争洪流中的两支支流。”^④分别给予了这次全国范围的大起义，这次起义中的回民起义，以充分肯定。还在四十余年前，在延安开始研究回族史时，李维汉（罗迈）评论咸同年间回民起义时就指出：“这个运动有伟大的影响与历史意义。因为这次运动空前的团结了回回民族，运动不但不分新老教的卷入了空西北的回回，而且还有云南杜文秀的起义，西南与西北的两大革命巨潮，激动了和吸引了全中国的回回。……在西南和西北坚持了十数年，为历史上回族斗争最持久的一次。运动的领导者中有许多杰出的人物，如白彦虎、杜文秀等，他们是百折不回的民族英雄。”^⑤人们应该怀着崇敬的心情回顾这次起义，缅怀这些英雄，充分肯定它的历史进步作用。

① 廖立语，载《三国志·廖立传》。

② 《三国志·邓芝传》。

③ 《鲁肃传》裴注《吴策》。

④ 《三国志·刘晔传》。

⑤ 《三国志·吴主传》。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历史系）